



【书林清话文库】

# 我与中国书店

周岩



河北教育出版社

书林清话文库

主编 傅璇琮 徐雁



# 我与中国书店

周岩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与中国书店/周岩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12

(书林清话文库/傅璇琮, 徐雁主编)

ISBN 7-5434-5657-5

I. 我… II. 周… III. 中国书店-概况  
IV. G23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0611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53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657-5/G·3671  
定 价 27.2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邮购电话: 0311—7731224 E-mail: wfbooksell@vip.163.com

# 从《学林漫录》丛刊 到《书林清话文库》

(代序)

傅璇琮

我于1951年秋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求学，至1952年8月，随我国高等学校院系大调整而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后毕业留校，担任浦江清先生主讲的“宋元明清文学史”课的助教。本以为就此可以在大学教学和科研的坦途上前进，不料在1958年年初，因所谓的“同人刊物”问题，与乐黛云、褚斌杰、裴斐和金开诚等人一起被诬为“右派集团”而身心俱受打击。

1958年3月，我从北京大学被贬逐至商务印书馆。我在北大是教书，只不过三四年，而且那时只是个助教，跑腿儿的机会多，真正上堂讲课不过少数几次；到出版社是编书，倒是每天与书打交道了（当然，“文化大革命”中有几年除外），编书生涯占去了一生中的大半辈子。但现在稍稍作一些回顾，编出的书真能惬意的，却也似乎不多。能说得过去的，我觉得只有《学林漫录》丛刊那一种。

到“商务”那会儿，也不过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但自我感觉似乎已入“中年”。那时“商务”在北总布胡同10号，由几个四合院组成，都是平房。

我所在的古籍编辑室，正好是在北屋西头，面对的是一个颇为典雅幽静的小院子。室主任吴泽炎先生打算在由云龙旧编的基础上重编《越缦堂读书记》，他可能觉得需要一个帮手，也或许看到我刚从大学出来，得收收心，就叫我帮他做这件事。

步骤是将由云龙的旧编断句改成新式标点，并再从李越缦的日记中补辑旧编所遗漏的部分。李慈铭也可以算是我的乡先辈，大学念书时读《孽海花》，对书中所写的他那种故作清高的名士派头感到可笑，但对他的认识也仅此而

已，现在是把读他的日记当作一件正经工作来做了，对这位近代中国士大夫中颇具代表性的人物及其坎坷遭遇了解稍多，竟不免产生某种同情。我虽然头上已戴了“帽子”，但那时对脑子里的“东西”却似乎还拘查得不严。

我是住集体宿舍的，住所就在办公室后面一排较矮的平房里，起居十分方便。一下班，许多有家的人都走了，我就搬出一张藤椅，坐在廊下，面对院中满栽的牡丹、月季之类，就着斜阳余晖，手执一卷白天尚未看完的线装本《越缦堂日记》，一面浏览其在京中的行踪，一面细阅其所读的包括经、史、子、集的各类杂书，并在有关处夹入纸条，预备第二天上班时抄录，真有陶渊明“时还读我书”的韵味，差一点儿忘记了自己的“罪人”身份。

但好景不长，1958年7月，由于几个老牌出版社“专业分工”的确定，我又被调转至中华书局。随即转入纷繁的编书生涯，“商务”那段短暂而悠闲的生活结束了，从此，“此情可待成追忆”（李商隐《锦瑟》语）了。

当时的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告诫我：“你就在工作中好好改造吧，安心看稿。”他是懂得爱惜专业人才的，并不让我去“下放劳动”，而是把我圈在作者的书稿中，专致于编辑业务。我为审读有关书稿，就上自《诗经》下至《人境庐集外诗》地翻阅了不少书。我在《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傅璇琮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的序中有过回忆：

按照我当时的政治处境，是不能写文章往外发表的。于是我白天审读、加工稿件，晚上看我要看的书。当时我处理陈友琴先生的《白居易诗评述汇编》，我提议由中华书局搞一套“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领导同意这一方案，于是把陈先生的这部书改名为《中国古典作家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我自己就搞《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和《杨万里范成大卷》。

我平时从中华书局图书馆借书，夜间翻阅。每逢星期天，则到天津街的北京图书馆看一天书，中午把早晨所带的馒头伴着图书馆供应的开水当一顿午饭。我的近二十万字的《杨万里范成大研究资料汇编》和七十余万字的《黄庭坚和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出来的，这也就是我真正做研究工作的起点。我没有荒废时间。

我那时就想尝试一下，在出版部门长期当编辑，虽为他人审稿、编书，当也能成为一个研究者。我们要为编辑争气，树立信心：出版社是能出人才的，编辑是能成为专家学者的。

应当说，中华书局三十年的工作，打下了我做学问的底子。我始终对这个环境是有感情的。我在《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1月初版，2003年5月重印）的“重印题记”中说过：“我在编辑工作中学到了那时大学环境中学不到的许多实在学问，这也得力于中华书局在学术界的特殊位置。但后来却又受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欺凌，以及因所谓世态炎凉而致的落井下石的遭遇。但我这个人毕竟是个书生，从50年代起，不管环境如何，总是抓紧时间读书作文。”

不过，头几年的事务也确实丛杂得够呛。刚到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即碰到新编唐诗三百首之事。在1958年的大浪潮中，对古人一切都要推倒重来，说是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美化封建社会”，对今天的读者毒素很大，我们要新编一本来加以“消毒”。新编当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依据什么“标准”。既然反旧编之道而行之，旧编“美化封建”，我们现在就要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于是以民间作品为主，把相传为黄巢的“反诗”以及民歌民谣优先选入，再收白居易、杜荀鹤等所谓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

编辑室内屡次为某些作品入选与否争来争去，编辑室一位副主任，可称“三八式”干部，后来总结这次新编的工作，认为自始至终贯串“两条路线”的斗争，无疑是把我和其他几位列入错误路线中去的。她解放前曾在邓拓手下做过事，有老交情，于是请邓拓当顾问，这本“新编”的前言即出于邓拓之手。当时大家都洋洋自得，认为牌子硬。

殊不料“福兮祸所伏”，1966年上半年批“三家村”时，把《新编唐诗三百首》也揭发出来了，说是邓拓借选诗，把唐诗中描写黑暗的作品大量选入，是借此攻击“大跃进”、“总路线”，把一个好端端的新中国搞得暗无天日、一塌糊涂。

那时我还在河南安阳农村搞“四清”，春夜静寂时，读到《人民日报》上的这一揭发批判文章，真是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我是参与者，明明白白知道诗是编辑室内的人选的，只不过选成后邓拓看看，怎么忽而变成是邓拓选的了，而且是邓拓借此而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了！安阳是殷墟的旧地，甲骨文是我们文明的老祖宗，我倚伏于中原大地上一个农家的昏微灯光下，面对着这篇“檄文”，真感慨于我们古老的历史传统中一种可怕阴森的东西。

《新编唐诗三百首》工作于1958年10月间结束，随即转入杂务。记得我刚进中华书局时，一位编辑室主任曾给我一部明季抗清的文臣写的文稿《邢襄奏稿》和《枢垣初刻》，叫我写一篇“出版说明”；后来还经手过顾颉刚先

生标点的清人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第三部是《顾亭林诗文集》，除了通阅、标点外，还要各写数千字的有评析的说明文字。1958年至1959年间文教战线“拔白旗、插红旗”，北大中文系师生编了一部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编辑室领导又命我做该书的责任编辑。而自60年代初期起，我又参加“二十四史”的校点。这样的一种上下千余年的工作，对于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的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锻炼”，但它们对于我也是一种事业上的兴趣，并不只是作为一种“任务”，我在理智上觉得应当把它做好。

而对于《学林漫录》，则完全是出于一种趣味上的爱好。1979年至1980年间，我任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由于工作关系，我在古典文学界之外，又结识了历史学界不少老年和中年学者，交友面比过去稍广了。我感到史学界的研究者，专业性似乎比古典文学界为强，对学术课题钻研较深，但他们与古典文学界中一些朋友一样，大多希望在专业范围之外，浏览一些虽然也是学术问题却比较轻松的漫谈式的文章。这时，我正好从朋友处看到香港出版的《艺林丛录》，受到启发，觉得不妨也编这样一种不定期的学术小品集。这正是《学林漫录》初集“编者的话”所说的缘起：

不少文史研究者或爱好者，愿意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就平素所感兴趣的问题，以随意漫谈的形式，谈一些意见，抒发一些感想。而不少读者，也希望除了专门论著之外，还可读到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的作品，小而言之，可资谈助，大而言之，也可以扩大知识面，开阔人们的眼界，启发人们的思想，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学林漫录》的出版，正是为了适应这样的要求。

至于编选的宗旨，仍用“编者的话”说便是：

《学林漫录》的编辑，拟着重于“学”和“漫”。所谓“学”，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学术性，要有一得之见，言之有物，不是人云亦云，泛泛而谈，如顾炎武所说的“废铜”。所谓“漫”，就是上面说过的不拘一格的风格与笔调。杜甫在他定居于成都时，写了一首《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的七律，有这样两句：“老去诗篇浑漫与，春来花鸟莫深愁。”是很有意义的。杜甫在他后期，诗律是愈来愈细了，但自己却说是“漫与”，似乎是说诗写得不怎么经心了。这是不是谦词呢？不是。老杜经历了大半生的戎马战乱，在离乱的生活中积

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稍有闲暇，又读了不少书，只有在这样的深厚的基础上，才能写出“浑漫与”三字，就是说，看来不经心，其实正是同一篇诗中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拿杜甫这首诗中的诗句，来为我们这本书的“漫”字作注解，恐怕是合适的。

《学林漫录》第一集出版于1980年6月。这一集是我一个人编的，筹备了大约半年，向一些文史界相识师友组稿。先是向我素所敬仰的启功先生索文，他欣然先写两篇，一是《记齐白石先生轶事》，一是《坚净居题跋》。启功先生的这两篇可以说是代表《学林漫录》的两大部分内容，就是记述近代有建树的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文章，以及包括各种内容的学术小品。这在当时，对不少读者来说，都有一种新鲜感，因此，颇受文史界以及其他行业中人的欢迎。正如第三集的“编者的话”所说：

读者欢迎已出的初集和二集，大约就在它的别具一格吧。所谓别具一格，从内容上说，就是所收文章的面较宽。举凡近当代一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事迹的记述，诗文书画的考析和鉴赏，古今著作的推荐和评论，以及读书随笔、序跋札记，只要一得一见，言之有物，均可登载。另外，从文章的风格上，我们主张不摆架子，不作姿态，希望如友朋之间，促膝交谈，海阔天空，不受拘束。

初集问世以后，我因其他事忙，就约了古代史编辑室的张忱石和文学史编辑室的许逸民两位合编。他们当时还不太忙，三人共同商量，事情就好办得多。《学林漫录》刊登学者、作家、艺术家的事迹，在当时为其他刊物所少见，而约请的写作者一般都是这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们的朋友、学生或亲属，亲炙日久，了解自深，行文又自自然、真挚，读来使人倍感亲切。这是《学林漫录》的一大特色。前后所记述的有齐白石、陈寅恪、张元济、朱自清、陈垣、黄侃、邓之诚等四十几位人物。

《学林漫录》的文章一般只不过两三千字，是希望不要给读者以过重的阅读负担。有的还仅数百字，如俞平伯先生的《德译本〈浮生六记〉序》（第八集）和钱仲联先生的《重修破山寺碑记》（第十二集）。前者是吴小如先生约来的，后者是许逸民同志和我有一次与钱先生一起开会，钱先生随便谈起时向他约的。两篇都用文言写：俞先生的序潇洒清脱，一如晚明风格；钱先生的记则奥义丽辞，直追六朝译经。



但《学林漫录》所收也有长文章，一是时任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的钱伯城。一次我到上海去，他说他写了老画家颜文梁先生年谱，几万字，当时哪家刊物都不能登，颜先生虽然无论人品画品都可称为近代中国油画界的开拓者，但人老了，知道的人不多了，实在遗憾得很。我遂以不拘一格为由向张、许两位推荐，在第六集一次性刊出。想要了解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油画的发展，此文是非读不可的。

另一长篇是北京大学吴小如先生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述》。这是吴先生的旧作，比钱伯城同志所作的年谱更长，从谭鑫培一直说到周信芳，共八篇，总计超过十万字。这样当然不可能一集刊完，于是与小如先生商定，每集刊两篇。本以为这样的专门记述不易为众人所注意，却不想引起轰动效应，不但像启功先生那样的大学者赞不绝口，据我的大学同窗白化文介绍，北大一位化学系教师，每集必捧读吴先生的这一长篇连载，寝食俱废。更怪的是，据他说，有一位肺癌晚期的在我国工程技术界颇有建树的长者，于平静的回光返照中，对自己的一生是满意的，别无眷恋，只惦记着要看看吴先生对马连良的评议最后究竟如何（《读〈学林漫录〉》，见《书品》1987 年第四期）。

我们几个人还立了一个规矩，那就是从初集起，每一集的“学林漫录”四字，都分别约请一些学者或书法家书写，这样集合起来不啻是当代名人书迹，不但有观赏价值，还有文献价值。初集由我约了钱钟书先生题签，以后几集则是下列诸位先生：启功、顾廷龙、叶圣陶、邹梦禅、黄苗子、许德珩、许姬传、张伯驹、李一氓、赵朴初、王蘧常、任继愈等，这也是别具一格之处。封面设计也是一贯的素雅沉静的风格。

自从 1980 年 6 月出版《学林漫录》初集以后，就进度和印数来说，可以说每况愈下，特别是在 1988 年出现了大滑坡。我曾就各集作了一个统计，初集 1980 年出，印了三万多册；第二、三、四集是 1981 年出，第五、六集是 1982 年出，第七、八集是 1983 年出，第九集是 1984 年出，这几集印数都在一万数千册。1985 年倒也出了两集（第十集、十一集），印数已跌进一万以内了。而 1985 年以后，1986、1987 两年都是空档，1988 年 1 月才出了第十二集，印数只有两千五百册。

这当然要亏本，出版部的同志不热心，经营管理的同志也提了意见。而相识的朋友，包括不少作者，是仍然很关心的，见到必问有新的出来否？有的开玩笑地说：《学林漫录》的“漫”应该改为“慢”了。

结果第十三集于 1991 年 5 月出版，印一千册；八年后出版了第十四集，印四千册。后来又把它们集合起来，换了封面重印过一次。中华书局拟陆续新

编，但恐怕不可能每年都编辑新集了。

在编辑《学林漫录》的过程中，我对于那些谈书人书事的文章就十分有兴趣，先后主张刊登过《傻公子的“傻贡献”——嘉业堂藏书楼的过去和现在》（许寅）和《书林琐记》（雷梦水）等，但毕竟侧重点不同，所用文章有限。多年前，在编纂《中国藏书通史》问世以后，曾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届毕业生，到南京大学工作后曾经有过多次学术合作的徐雁教授谈及，在此领域尚有文章可做。他表示即可筹划一套《书林清话文库》，大可裨补学坛，沾溉书林。我以为文库的立意颇佳，有关各书的选题，如韦力先生的《书楼寻踪》、曹培根先生的《书乡漫录》、孟昭晋先生的《书目与书评》、刘尚恒先生的《二馥斋说书》、谢灼华先生的《蓝村读书录》、周岩先生的《我与中国书店》以及来新夏先生的《邃谷书缘》、徐雁先生的《苍茫书城》、虎闾先生的《旧书鬼闲话》、林公武先生的《夜趣斋读书录》、胡应麟等的《旧书业的郁闷》、范笑我先生的《笑我贩书续编》，都极有文献价值和文化涵义。

按20世纪初叶德辉曾著有《书林清话》一书，以笔记体裁记叙古代版刻、藏书情况，多有专门知识性的掌故。但他未说及何以名为“清话”。按陶渊明有诗云：“信宿酬清话，益复知为亲。”（《与殷晋安别》）他与挚友临别，可以连续两夜（信宿）谈话，即清雅不拘世俗之交谈，故更为亲切。又“建安七子”之一刘楨有“清谈同日夕，情巧叙忧勤”（《赠五官中郎将》之二，《文选》卷二十三）；东晋时名士殷浩因事离开京都，宰相王导特约其共叙：“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于是，“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世说新语·文学》）。可见清话、清谈、清言，都有情深思切、朝夕细叙之意。我想，读者披览这套文库，也必有此感。我读韦力先生之《书楼寻踪》、周岩先生之《我与中国书店》，既有一种沧桑之感，更有对书林的缅怀之情。现在在邓子平先生的倾力支持下，经过两年多的组稿，基本形成了如今的格局。来自各地的作者们的书稿，尽管各自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他们钟爱书籍文化、探究古今图书的学术趣味却是共同的，想读者必会有“交酌林下，清言究微”（陶渊明《扇上画赞》）之趣。

《书林清话文库》即将付梓，按例不能无序，但又苦于事冗少闲，商诸徐雁君，徐君嘱以缀合旧文以为“代序”之法。四五年前，河北教育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我著述的两种书，如今又将印行本套文库，可见其赞襄学术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我谨致以谢忱。

2004年10月于北京西城六里桥寓舍

# 我与中国书店

许嘉璐

提到中国书店，心里就涌出一股难以言喻的亲切感和对已逝岁月的怀念。

我和中国书店发生关联是从二十二岁大学毕业开始的。四十多年来它始终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毕业后我跟随陆宗达（颖明）、萧璋（仲珪）先生学习“小学”，这是我和中国书店、和古书结缘之因。

老一辈人文学者教导后学，一般都是从目录学开始，弄“小学”更是如此。《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小学考》、《经义考》等就是我入门的书，常翻的书。等学识稍长，才去接触《隋书经籍志》之类以及现当代人写的书目（例如《四库提要辨证》、《贩书偶记》等）。

只读书目和提要而不见书，犹如旅游而不到其地，只读读导游小册子。北师大图书馆的藏书是丰富

的，但“非本馆人员不得入内”，于是逛旧书店就成了我见识古书的常规。隆福寺、西单、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尤其是琉璃厂的通学斋（当时已不景气）、来薰阁、中国书店，是我几乎每个星期天必去的地方。1959年毕业，正赶上为了“防修反修”而冻结工资，于是五十六元一拿就是十九年。这点钱，要买需要的或喜爱的古书，颇似现在工薪阶层想进五星级饭店去“潇洒”一番，谈何容易！记得有一次看到一部不错的《汉魏丛书》，没钱买，于是回家抱来才买不久的《鲁迅全集》卖掉，然后把《汉魏丛书》抱了回去。为这事我得意了好些天，但却要做妻子的工作；《鲁迅全集》可以从图书馆借，而《汉魏丛书》则可以在家从从容容地读！既然“囊中羞涩”，我的逛，当然就是翻看多而买少。翻者，打开来了解其版式、纸张、墨色；

看者,读序、览目,有自己需要的内容则细读。这是一座不要特许、不需花钱的书库,任我驰骋;旁边还站着有问必答的指导教师——书店的师傅们。到这里来无异于享受。

去得多了,和琉璃厂几家书店的师傅渐渐熟识起来。常常是我踱进书店正在翻书,忽然,背后一声“许先生您来啦”,转脸看,师傅笑咪咪地过来了。有些师傅的名字已经忘记,让我受益最多的两位则永远难忘。一位是王炳文,一位是马春槐(原本写作“怀”),都早已退休。马师傅已经多年不见了,听说身体还好;王师傅则还在店里帮忙,偶尔和我通电话,每次中国书店拍卖古籍,他都要寄来一本卖品介绍,大概知道我虽已不便随意到店里去,却一直关心着他们的事业吧。他们分别长我几岁、十几岁,并没有上过大学,却都身怀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不但熟悉版本和书籍的流传,而且对学界掌故、人事动态也都了如指掌。哪位先生藏书如何,近来身体怎样,哪位最近来过,正在写什么,需要什么书,几乎无所不晓。他们了解吴晓铃、启功以及赵元方诸先生并不奇怪,令我惊讶的是对并不常来这里的颖明、仲珪先生的学问和藏书情况,居然也都很了然。书店里还有一位雷梦水先生,早已从前辈那里知道他的造詣;及至当面请教,信然,不但经见的书多,而且诲人不倦。只可惜见他的次数太少。他

们是我增长古籍知识的真正的师傅,也是帮我了解前辈、领悟书海生涯的益友。

我至今怀念那时书店的布局和气氛:四周书壁,上可达顶,满室书香;屋子中间安一长桌,铺一白布,上有茶盘茶杯,两侧几把木椅。顾客可以随意从架上取书,坐到桌边不慌不忙地看,也可以请师傅代取,这时师傅还要给倒上一杯茶。有意购买,可以请师傅帮助找出其他本子以便比较;如不买,道一声“谢谢”即可离去,师傅还要送至门口:“您慢走,有功夫您再来。”“来的都是客,招待十六方”,他们对所有顾客一视同仁,有名的藏书、购书家来了固然有此款待,连像我这样小而穷的助教也能得到同样的礼遇,也被尊称为“先生”。我则因为是常客,主人已知所需,因而还获得了进入后面书库的特许。前年我又去了一次海王村中国书店和来薰阁,王师傅恰恰不在,失去了和他畅叙的机会。店里读者比过去多多了,还有不少外国人,所列几乎都是铅印本,也没有了当年那种诱人的感觉。

老师傅们对顾客的尽心尽力是现在的人们想象不到的。记得有一次我找《龙龕手鑑》,店里没有。马师傅说:“您先回去,我到库里去找找。”像这样麻烦他,已经多次了,我于是再次道谢。几天后,他足踏自行车竟然找到了我家,满头大汗地把书

送上楼来了。我一时真是无以为对。道声“谢谢”，奉上一杯热茶，实在不足以表达我当时的心情。“文革”结束不久，第一批研究生入学了。在经过了文化浩劫之后，线装书，哪怕是石印本也都很难见到，学生们更无从摸到买书的门路。不得已，我又找到马师傅拜托。不久，一大堆经学、小学书就送上门了。马师傅说：“大库的库底都让我翻过来了。不收进书来，别人甭想买了。”当学生们（现在都是已经是教授了）争先恐后地“抢”书时，我想，只有我能想象得出马师傅为此花了多少时间，费了多大劲，这里面包含着多少非语言可以表达的情谊。

颖明先生是章黄学派的巨擘，《说文》之学海内第一；仲珪先生始治金甲文，继而徜徉于高邮王氏之学，

晚年彻底服膺金坛段氏。他们二位都不是著名的藏书家，但是对古籍版本目录极熟，买书讲究实用。我既受钞票的制约，更受老师的影响，也是专拣便宜而质量好的买。所以虽然我的书不算少，却没有一册善本。但是我对它们格外珍惜，因为在那淡淡的书香和发黄的书页中，不但浓缩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还记录着我这一代人与书、与中国书店及其中人的关系，这也是中华文明的一个角落呀。

现在中国书店已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无形中成了传播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场所。我喜见它的发展，祝愿它更为发达，同时感谢它对我的陶冶，永远记住那已经难觅的独特的情调。

2002年10月29日于日读一卷书屋

# 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我**曾经说：旧书铺，现在叫中国书店，是我的安身立命之所。书店里的老师傅都是有功之臣。这是因为，做学问的人、搞传统文化的人，离不开古旧书，离开了就没法做学问。再者说，书店不仅是搞学术需要，它同时也关系着你的生活。你养活一家老小，得靠着它。因为咱们教书的，先得念书。要念书，就得买书。所以我说，书店是安身立命之所，就是这个意思。

我买书的年头儿当然很长了。我年轻时常去的书店有两处，一处是隆福寺的修绠堂，店主是孙助廉；另一个是西琉璃厂口里面翠文斋，店主是雒竹筠。孙助廉是河北束鹿一带人，身量儿不高，比较胖。他那书店有两间门脸儿，门口那块匾是沈尹默题的，当年还是牟润荪带我去认识他的。雒竹筠身材高，也是个胖子，那

是由我一个亲戚带我去的，他那店没门脸儿，就是在自己家里摆上几个架子卖书。要说书店里的这些师傅是不容易的。那会儿进书店先当学徒，每天要干这样几件事：头一样是早晨起来拿掸子掸书上的土，掸干净了放回去，这样掸土的同时也就慢慢记了书名、册数；然后学着修书，书老得翻动，书口容易坏，要用糨子、薄纸粘贴，这叫溜口。线装书，那线最容易散，所以还要学钉线，这都是最简单的；要说费力的，像补字。书的年头儿一长，保不齐哪儿就撕了、扯了，有那善书法的师傅能找来同样的书把缺字补上。还有手艺更好的，会补说部书里的那些绣像。这人我见过，姓王，名字忘记了，通县人。补出的绣像非常漂亮。书店里的人因为卖书，天天和书打交道，日子一长，许多人成了版本专家。你别看咱们是教书

启 功

的,遇到版本问题,不得不多向人家请教。人家卖一辈子书,经眼无数,版本知识不得了。在他们面前,咱们还不能端架子,要虚下心,多问多受益。比如,有的师傅待顾客非常热情,你在那儿挑了半天书,未了想买一部,刚要付钱,他过来了,说,您买的这部书不全,只是八卷本,那边有个十二卷本是全的,您再看看。

书店的人,也常给各个学校的学者送书。这些学者都是精通版本的行家。他们在挑书选书的时候,要对书的版本优劣作些评论,对书的内容进行考察,这样送书的伙计便能得到不少知识。知道哪个版本好,哪个版本是大路货,哪个全哪个不全,哪个

是先印哪个是后印的,哪个遭过禁毁。旧书店的人跟一般生意人还不一样。比方说,一般做生意,谁出的钱多就卖给谁。不过古旧书除去商品价值,还有文化价值,所以不少书店老板讲究货卖识家,卖给靠教书吃饭的知识分子,宁肯少赚点儿钱,为的是让书能发挥作用,在专家学者手里派上用场,而不是放在阔人的家里当摆设。这一点很难得。所以,表面看,他们虽然以买卖古旧书为生,但客观上在传播传统文化,开展学术研究方面有很多贡献。从这点上,我说他们都是功臣。

(陆昕整理)

# 为进一步恢复和振兴 全国古旧书业献策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化,特别是通过去年下半年隆重举办的“中国书店建店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我们利用不同方式,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党政领导、职能部门、新闻单位、专家学者,集中宣传和反映我国古旧书业的历史、现状、贡献和问题,引起领导和专业部门的重视、同情和支持,并逐步求得解决。同时,大大发挥了古旧书业自身的积极性,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克服一切困难,创造可能创造的条件,恢复和发扬古旧书业的经营特色和服务传统,不搞消极的等、靠、要。

现在北京古旧书业正在开始走出低谷,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又一个能够促使古旧书业生存、恢复、振兴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 and 有利条件,这些内外部环境 and 有利条件主要是:



从1981年10月举办第一届北京古籍书市起至2003年9月6日,共举办二十三届北京古旧书市,活跃了图书市场,丰富了文化生活,方便了读者购书,受到了赞扬和好评

第一,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与十四大精神,已经并继续给古旧书业解放思想、增强活力、转换机制、开拓经营、恢复传统、搞好服务等方面以强大的精神动力。

第二,蓬勃发展的我国出版发行事业,以每年六七万个品种、印行近



八十亿部册的速度递增；加上千百年来我国和世界各国无数书写和印制而成的各类书刊和其他知识载体的积累和传播，为古旧书业收售业务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广深货源。

第三，改革开放和长期的政治安定、和平建设，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文化素质、知识取向、情趣需求等不断提高，对中外文古旧书刊的阅读、购买、研究和收藏需求日益增加，国内市场日趋扩大。国际市场还是一个未被开发的领域，购买潜力深广。

第四，党和国家、人大、政协以及北京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知识界等对古旧书业的性质、特点、地位、作用和当前处境等方面的了解、关心、同情、支持及其对古旧书业已经出台的政策，对古旧书业的生存、恢复、振兴和发展空前有利。诸如萧乾、王益等十多位政协委员提出的要求政府给予古旧书业减免税收等优惠政策提案，已经有了初步结果。

第五，为解决全国古旧书业生存、恢复和发展等问题的全国古旧书业发行工作会议，其文件已经准备就绪，并已列入新闻出版署领导的议事日程，将力争今年召开。

第六，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去年计划为文化工作办十件实事中有关“采取优惠政策、筹集资金、分期对古旧书店危旧网点进行修缮改造；为增强

北京古旧书业的维持、发展能力，对中国书店的旧书收售给予优惠政策；选择适当地点开辟古旧书业一条街”等三件全部得到落实和兑现，这对北京古旧书业的恢复和发展，将起到重大的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七，全国古旧书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和交流逐渐加强，自愿联合、实行民主管理、争取和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以促进全国古旧书业恢复和发展为己任的中国发行协会古旧书专业委员会已经成立。

第八，我国历史上许多古旧书店如中国书店、上海书店、天津古籍书店、重庆古旧书店，以及广州、武汉、成都、南京、杭州、西安、沈阳、苏州、扬州等地古旧书店在新中国成立后四十多年来，在保持古旧书业经营特色、发扬优良服务传统方面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近半年来北京海淀古书一条街较好地恢复、坚持和发展了上述特色和传统，总结出一些新的经验。这些经验如果能够引起同行们的重视，进而结合实际加以推广，将对恢复和振兴北京乃至全国古旧书业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

第九，中国书店的党政领导在多年的实践中深切地认识和体会到，古旧书刊收售经营活动乃是中国书店旗帜性的经营活动，是贯彻执行古旧书业性质、特点、方针、任务最重要和最具体的体现，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社会文化意义以及经济